



社会语言学研究

劲松 ◆ 著

SHEHUI YUYANXUE YANJIU

现代汉语“儿化”动态研究
双语和语言应用研究

民族出版社



社会语言学研究

劲松 ◆ 著

SHEHUI YUYANXUE YANJIU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语言学研究 / 劲松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105 - 09961 - 0

I. 社… II. 劲… III. 社会语言学—文集 IV.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4101 号

社会语言学研究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http: //www. mzcbs. com](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 625 1/32

印 数: 0001 - 1500 册

定 价: 25. 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961 - 0/H · 694 (汉 20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已日趋成熟，成果斐然。它沟通古今，关注人文，重视调查，将语言与其使用者密切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语言与社会在发生和发展上的相辅相成关系，使语言的历史和本体研究得到更加科学的诠释。社会语言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人本思想，大大开阔了语言学的研究视界，是语言学从历史和结构的研究提升到系统工程研究的津梁。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有密切联系实际和关注现实的传统，在当前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语言出现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语言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劲松教授长期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以现实中出现的重大社会语言问题作为研究的目标和方向，研究的内容涉及普通话、双语双言、语言规范、语言教学、新兴语言等各个方面，视界广阔，研究深入，对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理论上对中介语的研究，在语言实践上对普通话重要语音特征儿化的研究，更有突出的表现。中介语历来是语言教学的研究内容，具有解决语言教学的方法论意义。劲松教授将中介语僵化的理论引进语言的历史和本体研究，与语言的变异和变化结合起来，开拓了中介语研究的新领域。儿化是普通话的重要语音特征，在描写、规范和使用上都存在分歧，成果虽多，在研究上缺乏有效理论的支撑，在规范和使用上没有科学调查资料的依据，影响了普通话的推广和现代汉语的研究。劲松教授深入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去伪存真，全面研究了几化词的语音、语法、语义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形素变化上提出了原形黏合式、单向变形

黏合式、双向变形黏合式，构建了几化方式的新语音模式；在语法研究上确立了儿缀词、儿素词、派生儿化词和复合儿化词的新概念；在语音演变研究上通过以儿化新语音模式为纲的过程和层次的分析 and 描写，概括出儿化过程的主要变化原则；在语义研究上提出了儿词缀的韵律意义和示律功能的新概念；特别是通过社会调查，在语音和词汇上对儿化词进行了变化和变异的研究，为普通话的规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普通话儿化词的研究是她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研究方向，也是她继出版《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一书后的主要研究课题。

在语言学科中，创造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固然具有创新、启发和开拓的意义和作用，但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都需要经过科学的验证和实践的检验，一种新理论和方法的创建，并不表明必然成功。在当前急功浮躁的研究环境中，无论中外，有的所谓新理论与事实不符，经不起科学的重复和实践的验证；有的虚有其表，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有的借鉴拼凑，不成系统。因此，对新旧语言理论进行科学的反思和验证，对一些新兴语言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是一项虽然不讨好却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否则一些伪理论和各种理论中的错误和缺陷常常会当成定论写进教科书，广为传布，贻害后学，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劲松教授在研究中注重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深入思考，去伪存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仅纠谬勘误，同时也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应该说这样的研究同样具有创新性和重要的科学价值。这是我与劲松教授长期合作中的一个共同体会。在此书出版之际，以此与劲松教授和学界共勉。是为序。

瞿福奎

2008年7月于京

目 录

上篇：现代汉语“儿化”动态研究

一、关于儿化词的研究	3
二、儿化词的语音学研究	41
三、儿化词的音系学研究	69
四、儿化词的结构和意义	96
五、儿化词的变化和变异	127
六、儿化词的发生和发展	177
附录一 儿化韵调查表	216
附录二 儿化词调查表	218
附录三 参考文献	223

下篇：双语和语言应用研究

七、双语的性质和中介语研究	231
八、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	245
九、双语学习中目的语对基础语的影响	257
十、语言态度与双语现象	266
十一、普通话的功能和存在形式	282
十二、被字句的偏误和规范	302
十三、流行语新探	317
十四、漫谈“洋味儿”汉语	330
十五、网络语言是什么语言	339

十六、语言学习、语言能力与大学语文教育	343
十七、词的认知基础——评王立先生《汉语词的社会 语言学研究》	351
十八、语言规范的现实性、动态性和前瞻性	359
参考文献	363
后记	365

上篇：现代汉语“儿化” 动态研究

一、关于儿化词的研究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研究中，“儿化”是一个历来受到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儿化”从字面上来说，是一个语音的概念，指儿词缀“化”入前面词根最后音节的现象。所谓“化入”是一种语音在语流中的协合变化，类似语言中一般的同化、异化、增音、减音等常见的共时音变现象。后来“儿化”研究的内容日益扩大，“儿化”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指语音的这种协合变化，而且概念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不同的“儿化”现象时，所指的内容并不相同。从语音学角度研究的是卷舌元音、儿音、儿化音；从音系学角度研究的是儿韵和儿化韵；从语法学角度研究的是儿词缀和儿词素；从词汇学角度研究的是儿化词；从语义学角度研究的是儿词缀、儿词素甚至整个儿化词的意义。分不清研究的对象，就会因方法不当，得出错误的结论。譬如在研究“儿化”的语音时，只看到语音学和音系学的共同性，却看不到两者的差异性，这样就把对“儿化”语音的定性和定位混淆起来，为了音系学标音的方便，任意改变儿音和儿化音的性质，把一个音变成两个音。再譬如，在研究“儿化”的语法时，不区分儿缀词和儿素词，儿缀词是派生词（锅贴儿、宝贝儿），儿词缀是加在整个词根上的；儿素词是复合词（果汁儿、手套儿），儿词缀是加在末一个词素上的。从构词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儿词缀功能不同；在研究“儿化”的词汇时，不考虑变异和变化的因素，就不能准确把握“儿化”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在下文将从多角度和多方面来详细讨论有关“儿化”的理论、方法、材料和操作等相关问题。

“儿化”这种关联到语音、语法、语汇、语义等多个层面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现代汉语中，在汉语方言乃至汉藏语系语言中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藏语（拉萨）中就有一个 [bu¹²]（儿子），可以变成 [u] 音“化”入前面的词根，如 [piu⁵⁵]（[pi] + [u]）“猴子”，[tiu¹⁴]（[ti] + [u]）“子弹”等，也有表示“小”的色彩意义。汉语方言中更是丰富多彩，有的地方（山西交城）的儿词缀是不“化”的，读成独立的音节；有的地方（保定）有些韵母可以“化”，有些韵母不能“化”；不仅北方方言中儿化，南方方言（浙南吴语）中也儿化。“化”到前音节的音和方式更是各不相同，主要是“化”在音节末尾，使韵母发生变化；也有的地方（山西平定）还“化”到音节的中间，成为儿化中缀，形成所谓的“嵌l词”。儿化原指一种共时现象，研究共时的语音协合变化，但也有历时的儿化现象，即所谓的“小称变调”和“小称变音”等。这种“变调”和“变音”（温岭、宁波、台山）已经找不到确切的共时语音条件，成为历时的变音，但通过历时或方言的比较研究，能够确认历史上原来的词缀。很多地方有所谓的“儿变音”、“子变音”等语音变化，都是这种相关的历时“儿化”、“子化”现象。只是在不同汉语方言和汉藏语言中，形式、功能、意义都不完全相同，各有特点。

（一）“儿化”的特点

现代汉语“儿化”当然是一种共时的语音协变现象，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发生上的多源性。是指“儿化”现象的发生不是一种来源，而是多种来源。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儿”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后缀。三个来源：

（a）里→儿：这_儿，那_儿，哪_儿（变轻声：我·这_儿，你·那_儿）

(b) 日→儿：今_儿，明_儿，昨_儿，前_儿，后_儿，几_儿

(c) 儿→儿：一般说是指小，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名词标记。”^①

李思敬先生加了一个“了”的来源，根据是京东话，譬如“心里就像开_儿（了）锅似的。”^② 由于作为普通话语音基础的北京城里的话没有这样说的，这种说法应是“一方之言”，不属于现代汉语研究的范围，因为有的北方方言（辽宁长海）中，“了、着、到、在、得”都能儿化。

赵元任先生所说的三种来源，现在虽然已经成为经典，为绝大多数著作所引用，但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所谓来源是指因果关系，汉语中由原来类似“幼儿”中的词素“儿”逐渐轻化而成为词缀，这种“儿”词缀来源的儿化词，应该是标准的。譬如“盖儿、盘儿”这样的儿化词，其中的“儿”与“盖子、盘子”中的“子”具有相似的功能性。但这种来源的儿化词在现代汉语的儿化词中已经只占少数了。此外，赵先生说：儿“实际上只是一个名词标记”，似也可考虑。因为像“玩儿、颠儿、火儿”是动词，“条儿、件儿、棵儿”是量词，“滋儿、不儿”是象声词，可见“儿”不完全是名词的标记，因此不能说“只是”，至多说更多地是出现在名词中。更不用说出现在“红红儿、白白儿、快快儿、慢慢儿”这些形容词和副词性重叠形式中的“儿”。“日”的来源从表面上看，“日”和“儿”音近，从语音上说，由“日”变读成“儿”，因为音近有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所以可以判定为来源关系。可“日”是一个常用字，构成的语词极多，但可以儿化的却只有这几个，说它来源于“日”，值得怀疑。如果说这几个词口头上常用，所以容易引发儿化，那么比如“生日、改日、大天白日、节日、假日、早日”也是非常口语化和口头上常用的词语，这些

①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② 李思敬：《汉语“儿”[ɐ]音史研究》，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词语为什么不能儿化？因为从语音上说明“日”变“儿”是基于语音协变（轻化）和类推（近音联想）的原理，应该是自然发生的，是一种发音习惯。习惯是一种语感，具有类推性，大多数带“日”的词语不能类推，只有少数词语能够类推，说明这种儿化可能不是由“日”经语音协变后类推成“儿”的。再说“里”的来源，它和“儿”在语音上并无协合和类推的基础，更不可能存在语音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也不是来源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替代关系。替代关系不是来源关系，譬如，张三代李四，不能说张三来源于李四。“儿”所以会代替“日、里”，是因为“儿”的主要功能是一种表示语言个性和风格的韵律功能，像“唱片儿、奔头儿、同伴儿、热门儿”等等，并无具体的语义，只表示一种韵律，一种语言的习惯和风格。这种习惯与满族入主中原学习汉语有关，“今儿、明儿”和“这儿、那儿”只满足一种韵律的要求，或者说是因为习惯的需要对原来词语的改造。今天，这种习惯虽然已经逐渐淡化，但还起着一定的作用。譬如，把“张队长”和“李所长”称为“张队儿”和“李所儿”，这显然是一种新的称谓方法，是用“儿”替代了“长”，不能说是这个“儿”来源于“长”。可见，儿词缀只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汉语原来的儿词缀，一是出于韵律要求而派生的。这种韵律要求与满族人学习汉语时的中介语，即满汉中介语有关，而中介语具有过渡性特征，或者说，这种习惯具有时间性，因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基础语终究要靠近目的语。这样，我们解释和说明少量词语儿化，而不发生类推现象就顺理成章了。满族把这种具有特征性的发音习惯带进汉语，先与固有而音近的儿词缀结成一类，再与儿词缀一起逐渐减缩为儿音。这种本来与儿词缀没有关系的儿音，一旦形成与汉语中原有的儿词缀相同的发音习惯，就能按需要和习惯添加到另一些词根上，或者替换原来词根中的有关词素，构成与原来儿词缀性质不同的儿化词。这种习惯虽然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习

惯，今天已经淡化，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还能表现出来。据李思敬先生从文献上考证，至迟在乾隆年间“今日、明日”中的“日”已经儿化成儿音了。^①赵杰先生的研究则指出，满族到嘉庆时期满语和汉语的换用已经基本结束，^②可见在乾隆时正是满汉中介语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中介语中常使用的是语音的替代手段，因为不是语音的协合变化，没有类推性，所以这些“日”儿化，那些“日”就不一定儿化；“这里”儿化，“屋里”就不儿化。当然，儿化这种韵律性功能，并不始于清朝，在同是使用阿尔泰语言蒙古语的元朝即已开始，通过明朝的继承和发展，满族只是在元明儿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扩展。

2. 音变的可预期性。是指儿化在语音协变过程中，具有强制性。语音的共时协变具有强制和非强制两种。由于历时的协变都是强制性的，所以容易反推，也容易引起误解，认为强制性的音变都是历时的音变。现代汉语中语气助词{啊}的形位(Morpheme)变化([ia、wa、na、ŋa]等)是非强制性的，只出现在语速较快和比较随意的语境。如果语速放慢或加以强调，就可以只读本音不发生协变。儿化这种协变是强制性的，从语感上就不能拆分，与语速和语境无关。说现代汉语的人对儿词缀具有双重语感：在语音层面上具有不可拆分的语感；在语素层面上则具有可拆分的语感。正是这种可拆分语感，才能创造出上述“张队儿、李所儿”这种新的儿化词。尽管“队儿、所儿”在语音层面上的语感不能拆分，但作为语素层面上的语感则是可以拆分的。“张队儿、李所儿”中的儿词缀正是根据这种语素层面上的可拆分语感，用表示韵律意义的“儿”替代了“长”，从而创造出“张

① 李思敬：《汉语“儿”[ɐ]音史研究》，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② 赵杰：《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队儿、李所儿”这种新的儿化词。由于现代汉语的儿化几乎可以发生在所有韵母上，不能简单地判定它是共时变化还是历时变化，而是要通过语音的规则和条件才能说明和还原（详见下文）。北京周边地区儿词缀在语音上“化”和“不化”却是并存的。譬如，保定话〔ɤ、ei、ai、ən、an〕可以儿化，而〔ɿ、ʮ、i、ɛ、a、y、u〕这些元音和带〔ŋ〕韵尾的韵母则不能儿化；满城则除了带〔ŋ〕韵尾的韵母不能儿化外，其他元音都能儿化，带〔u〕韵尾韵母则可以儿化，也可以不儿化，处于两读状态。^①这种儿化和不儿化并存的状态反映了几化的过程，也说明了几化是协合音变和发音习惯的性质。因为我们总不能以是否具有强制性，把保定和满城这种极具规律性的语音变化，一部分视为共时音变，一部分视为历时音变。非强制性和两读性儿化的语音条件正好反照出强制性儿化的语音条件。具有实时语音条件的反推性正是判断共时音变的基本原则。

3. 语音和应用的变异性。指儿化读音和儿化词应用上的不统一性。任何事物的变化都要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语音系统是一个由语音功能单位构成的有序系统，语音系统发生变化，首先是作为系统功能单位的音位或音丛（声母和韵母）发生变化，音位或声母、韵母的变化与其他事物一样要经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过程包含两个函数：一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因为语音变化是通过人来传播的；二是包含这个变化语音的词。因为语音的变化必须依靠词的扩散来完成。词的扩散由人的传播来实现，人的传播由词的扩散来完成。于是研究发生变异的语音和语词在扩散过程中与人的关系就成为说明语言变异的一个重要内容。

儿化的变异既涉及语音，即儿化韵；也涉及词汇，即儿化词。

① 陈淑静：《河北保定地区方言的语音特点》，载《方言》1986（2）。《河北满城方言的特点》，载《方言》1988（2）。

呈现出因人而异的特点。比如带 **ng** 韵尾的音节，“灯儿、坑儿、声儿、铃儿”等在儿化后，有人读鼻化元音，有人不读；再比如“小吃、靠山、当面、零花”等词，有的人儿化，有的人就不儿化。

(1) 语音的变异

现代汉语儿化读音上所反映出来的变异现象，比上述带 **ng** 韵尾的音节的变异要复杂得多。

一般认为儿化韵有 26 个：

ər	ɤr	or	ar	aor	our	ār	ǎr
iər	iɛr	iar	iaor	iour	iār	iǎr	
uər	uor	ur	uar	uār	uǎr	ūr	
yər	yɛr	yar	yǎr				

但各家确定的儿化韵却分歧很大。譬如，有人认为 $ər = \mathfrak{y}r$ ，即泪儿 = 乐儿、根儿 = 歌儿。这是《汉语拼音方案》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的观点；也有人认为 $er \neq ər$ ，即“杯儿”、“黑儿”与“根儿”、“字儿”韵母不同；有人认为 $i\mathfrak{a}r \neq i\mathfrak{e}r$ ，即架儿 ≠ 件儿、“（脚）丫儿”与“（一）点儿”、“芽儿”与“烟儿”的韵母不同；有人认为 $uer \neq u\mathfrak{e}r$ ，即柜儿 ≠ 棍儿、堆儿 ≠ 墩儿；有人认为 $y\mathfrak{e}r = y\mathfrak{e}r$ ，即（小）菊儿 = （旦）角儿、玉儿 = 月儿，等等，不胜枚举，可见分歧之大。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和说明。

(2) 儿化词的变异

主要是读与不读和两读（可读可不读）的变异现象。这种变异现象大体与语言环境，即家庭环境（指父母的语言状况）、居住环境（指胡同、机关大院、高层公寓等）和居住地区（譬如，不同的区县）有关，也与语言能力有关，譬如，年龄差异、文化程度、工作性质等；此外，就是与语言状态有关，即日常生活中是主要使用北京话还是普通话。

在我们对 250 多个儿化词和 150 多人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儿化

率最高 80% 左右, 最低不到 50%。两读平均率占到整个调查词的 20% 左右。几乎没有一个语词是全部读儿化或全部不读儿化的, 换句话说, 这些词在不同的调查对象中是交叉差异的。这充分说明了儿化词的变异性和活跃性。像“蛋白、猩猩、太太、好看、半边、改造、单调、讲究、靠山、随便、谜、小吃、板擦、背影、冰锥、筹码、当面、高矮、号码、得空、落款、高矮、裤脚、腊肠、蜜枣、长袍”等这些原来读儿化的词现在已经倾向不读或两读。

4. 功能上的韵律性。现代汉语中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儿词缀: 一个具有示律功能, 即表达一种语言的语音风格、习惯和特点, 只具有韵律的意义; 一个具有构词功能, 即语词构成中的变义和变性功能, 具有词汇和语法的意义。从发生角度来说, 儿词缀起源于构词的需要, 受汉语语法规则的制约; 从发展角度来说, 表示韵律意义的儿词缀无论在数量和应用上都大大超过表示词汇和语法意义的儿词缀。表示韵律意义的儿词缀占两种儿词缀总数的 80%。儿词缀的这种韵律性意义和特征, 应该是北方方言的共同特征, 南方方言中只有表示词汇和语法意义的儿词缀和“儿化”现象, 没有这种表示韵律意义的儿词缀。但在北方方言中, 作为普通话基础的北京话, 这种表达示律功能和韵律意义的儿词缀尤其突出, 无论在数量和应用上都超过其他的北方方言, 形成了所谓京腔京韵的特点, 也成为普通话的一个特点。

正由于上述儿化词的特点, 现代汉语的儿化词研究涉及语音学、音系学、语素形位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等诸多学科, 成为现代汉语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我们将从语音学、音系学、语素形位学(形态音位学)、语法学、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诸方面, 对现代汉语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动态、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进行重点的介绍和说明。